

世界军事译丛

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

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

当代安全与战略



[澳]克雷格·A·斯奈德 等著
徐纬地 等译
封长虹 校
吉林人民出版社



SHIJIE JUNSHI
YICONG



世界军事译丛 主编 封长虹

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

当代安全与战略

[澳]克雷格·A·斯奈德 等著
徐纬地 等译
封长虹 校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安全与战略/(澳)斯奈德等著;徐纬地等译。
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8

(世界军事译丛)

书名原文: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

ISBN 7 - 206 - 03841 - 7

I . 当… II . ①斯… ②徐… III . 国际问题—安全—研究 IV . D8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7197 号

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

Copyright(c)1997 Craig A. Snyde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c)2001 by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acmillan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0—377

当代安全与战略

著 者	克雷格·A·斯奈德等	译 者	徐纬地等
校 者	封长虹	封面设计	翁立涛
责任编辑	吴兰萍	责任校对	吴 岚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市华艺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75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5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 - 206 - 03841 - 7 / E · 12
定 价 14.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内容提要

本书出版于1999年，可以说它是西方学者研究国际安全和战略问题的一部较新和较有分量的著作。该书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该书是为适应冷战后新的国际安全环境、新的国际战略现实需要而对安全与战略理论进行的重新审视与研究。在本书中，当前存在的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争论得到了反映。例如，关于安全概念外延扩大的讨论、有关“民主和平”问题的争辩、对核扩散问题的叙述和讨论，以及有关“军事革命”问题的研究。该书虽然是一部理论研究著作，但同时也有非常明显的现实政策含义。因此，若结合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现实来读这部书，无疑从中会有所受益。

其次，该书作者虽然都是西方人士，但其中大多不是美国人。应该指出，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尤其是在安全和战略研究领域，进展较大、成果较多因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是美国学者。正如本书主编所言，冷战时期的战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人研究美国的安全”。而本书作者则似乎有意要同美国的安全和战略研究拉开一点距离，它既反映出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安全和战略研究的新进展，对当代西方国际安全和战略研究的各种理论和流派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介绍，同时又以较美国学者有所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安全理论和政策问题。

第三，该书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安全与战略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试图拓宽安全研究范围，从纯军事的战略研

究领域扩展到把非军事领域也包括进来。”因此，该书视野较宽，内容也较全面。书中不仅分析了对西方国际政治传统理论支柱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演变，还对作为其对立面而出现的批判性安全理论做了较深入的阐述和探讨，并且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西方有关地区安全方面的主要理论。可以说，此书大致反映了西方国际政治、安全和战略理论研究的新动态。

最后，军事安全问题仍是本书的重心。如本书主编所言，本书是以新的理论方法研究传统问题，而传统的安全问题的中心是军事问题。因此本书有大约一半的篇幅是讨论军事问题。其中包括战略思想的演变（第二章）、冷战时期占据安全中心地位的核威慑问题（第六章）、核武器的未来地位和作用（第七章）、核扩散问题（第八章）、作战样式的发展和局部战争问题（第九章）及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军事革命问题研究（第十章）等等。这本身就是对军事研究在安全研究中地位问题的一个回答：尽管安全研究的范围可适当拓宽，但军事问题在安全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鉴于上述几个特点，可以说，该书无论是对专门从事安全和战略问题研究的专业人员，还是对学习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青年学生，以及对国际问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来说，都是一本不错的参考书。

总译序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世界军事的发展极为令人瞩目。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导致冷战后的世界并不安宁。世界大战虽然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爆发，但局部战争却连绵不断。美伊矛盾引发了海湾战争，南斯拉夫问题引发了科索沃冲突。目前，人类已经进入 21 世纪，而战争与和平问题一个也未得到彻底解决。人类仍然面临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甚至面临着意外的核武器的威胁。世界范围内的安全问题令人忧心重重。鉴于此状，我国国际政治与军事研究领域内的仁人志士均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战争与和平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上，以求在安全环境和战略指导上寻找突破口。国外的情况也不例外。《世界军事译丛》原书作者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向世人奉献出了他们独特而又新颖的观点和认识。译丛本身则旨在介绍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安全与战略等重大问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从而尽可能全面地向读者展示一幅世界军事的整体框架与宏伟画面。译丛所选内容既揭示了战争历史的演变过程，也反映了人类对和平的渴望与追求；而译丛书籍的选择既注重学术研究的理论价值，又兼顾读者需求的客观趋向，因此可以说该译丛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可读性。

但是，译丛的规划与组织是一项很复杂的工程，要从众多的书目中选出非常合适及完全理想的书籍并非一件易事。此外，翻译本身又是一件要求很高但又乏味的工作，要组织优秀的翻译力量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令人欣慰的是，我军各单位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军事科学研究人员和军事学术翻译人员，他们的学识令人钦佩，他们的外语水平令人刮目相看。参加本译丛翻译的人员大都工作在我军最高研究机构和我军最高学府，具有军事学博士、硕士、学士学位，并在多年的军事科学研究实践中均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他们加入此项工作的翻译将使本译丛蓬筚增辉。我们相信，译丛的出版对于从事国际政治及外国军事教学与研究的人员大有裨益，对于关注战争与和平、安全与战略的人士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广大的军事爱好者更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感谢吉林人民出版社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把译丛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这在今天虽不是一种时尚，但却是一种难得的可贵，这是本译丛得以成功翻译出版的关键所在。

译丛主编
2001年7月于北京西山

前　　言

本书是为适应对当代战略研究进行重新审视的需要而问世的。除了有必要对冷战后头10年中影响深远的变化进行考察外，作者们还试图拓宽安全研究范围，从纯军事的战略研究领域扩展到把非军事领域也包括进来。本书的目的在于为学生指明方向，以免其迷失在安全研究中那些层出不穷的新概念里。它结合了北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安全观点，对安全研究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探讨，包括战略思想、安全理论、批判性问题以及冷战后安全的发展。

在此感谢本书所有的作者，感谢他们对本课题的执著和所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使得编辑过程成为一件乐事。我特别要感谢我在迪金的同事：莫汉·马利克，感谢他对全书的贡献，以及他在该计划初期所提供的帮助和指导。我还要感谢澳大利亚及国际研究院院长若昂·博蒙女士，感谢她的学院对本课题的支持。最后，我还要感谢我们的出版商斯蒂文·肯尼迪以及那些未署名的评论者，感谢他们对初稿的评论，特别是在1998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手稿因此而推迟的情况下，斯蒂文表现出来的耐心。

克雷格·A·斯奈德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当代安全与战略	克雷格·A·斯奈德(1)
第二章 战略思想的演变	J·莫汉·马利克(16)
第三章 现实主义与安全研究	辛·M·林-琼斯(65)
第四章 走出战略：批判性思考与 新安全研究	戴维·穆提默(95)
第五章 地区安全结构	克雷格·A·斯奈德(125)
第六章 理论与实践中的理性威慑	凯斯·克劳斯(147)
第七章 核战略的未来	安德鲁·巴特弗伊(175)
第八章 核武器的扩散	理查德·格雷(196)
第九章 现代战争的发展 克雷格·A·斯奈德 J·莫汉·马利克(220)
第十章 重新设想战争：军事革命	安得鲁·拉瑟姆(239)

第一章 当代安全与战略

克雷格·A·斯奈德

冷战的结束使安全研究发生了形态转换。人们被迫重新思考支撑安全研究的基本假说。从总体上说，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安全研究的一些关键性概念面临着变更：安全、权力、冲突，以及民族国家。50年来，有关国际冲突的学术性理论描述都是在冷战和两极格局主导下进行的。学者和决策者都一样是在该国际“体系”内解释和预测冲突。但是，他们对冲突本身却未必感兴趣，主要是关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这部分是由于大多数冷战安全理论家都是带着现实主义的范式来观察世界的。现实主义者辩称，国际体系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状态，各国的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或安全。这样，最强大国家的行为也就成了研究国际体系的学生最关注的对象。

现实主义者辩称，以国家为中心的两极冷战是维系国际稳定的最佳保障，而冷战后的多极体系将导致秩序混乱。约翰·摩尔希默（John Mearsheimer）是最早对冷战后安全环境的潜在不稳定性提出警告的人之一。他争辩说，冷战的秩序是通过世界分为两极，以及两极之间军事力量的大致平衡得以保持的。而蔓延的核扩散，不羁的民族主义，以及其他不稳定力量，这些在两个超级大国支配下迄今为止一直被抑制的因素将会被解

放出来，从而导致冷战后世界的动乱和无政府状态，而不是造就一个更有序、更可预见的世界。

另一些人，如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看法却稍有不同。布氏预言说，国际体系将处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世界观和更加相互依存的倾向两者之间。他断言，国际安全将在两个状态之间演变。一端是国际局势的无序加剧：欧洲分裂、前苏联各共和国陷入战乱，而亚太地区则由于地区霸权竞争者的崛起而失去稳定；另一端则是，在美国有选择的战略承诺支持下，欧亚国家扩大安全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秩序。

前者的效应已经在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得到体现。在那里，由于苏联霸权的崩溃，导致冷战对国家行为的约束被种族对立所取代。而在合作的一面，欧洲和亚太的地区性国家都把地区性组织，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地区性论坛，看作规范其国家间相互安全行为的最有效的途径。

随着冷战两极格局的消失，需要提出新的安全观念，以适应冷战后世界的军事现实，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在军事方面，核战略与威慑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未来战争的性质等问题将依旧成为主要的关注焦点。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关于战略的理论基础，国际安全（包括地区安全），以及冲突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根源等问题。

什么是战略研究和安全研究？

在战略或安全研究领域，大多数文献要么是聚焦于以传统办法对付传统问题，如约翰·摩尔希默或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等人的著作；要么是以新的办法对付新的问题，如辛西亚·恩

洛伊（Cynthia Enloe）对全球力量关系的女权主义调查；另一些人的研究，如马克·莱维（Marc Levy）论环境安全的著作，布莱德·罗伯茨（Brad Roberts）论人权的著作，以及麦龙·温纳尔（Myron Weiner）关于移民问题的研究，则是以传统的手段来处理新问题。这些著作力图拓宽传统现实主义有关安全的概念，将一些非军事的安全威胁因素，如环境、人权以及跨界流动人群等问题也包括进来。此外还有一个途径，即本书所采用的，以新的办法，重新开展对威慑、扩散以及军事革命等传统问题的争论。因此，本书超越了主导安全领域研究的现实主义分析，以保持这些新方法的内在的连续性。它还通过审视从社会或个人层面到地区或全球层面等不同层次的安全问题，对深化安全研究的进程作了探索。

作者们是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下联合起来的：现实主义只盯着国家所面临的来自境外的军事威胁，已经不足以判定什么或谁是否安全，这些是什么样的威胁，以及它们源于何处这样一些问题了。

然而，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究竟从哪里将安全研究并入更宽泛的国际关系研究的概念结构体系。看起来，将安全研究看作国际关系的一个子领域，就像国际法一样，是符合逻辑的。但是这样做的问题在于，安全研究的许多重要的问题，难以同国际体系的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中分离出来。如果不了解各方对立的根源，不考虑诸如实力、态势、意识形态和财富等问题，就干脆无法弄清楚战争的军事含义。政治依旧是战争的主要根源。正如莫汉·马利克（Mohan Malik）在第二章中所展示的，早期的战略家们，尤其是克劳塞维茨，都把战争看作是政治的暴力形式。而在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看来，“如何将力量变成一种合理的政策工具，而非无头脑的屠夫

……即如何将政策和战争统一起来”，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对各个不同的子领域进行区分，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带有人为性，难以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精确判定，但就提供一个安全问题的分析框架来说，这却很重要。安全研究的广阔范围提供了学术合法性，而战略研究则在军事核心问题上提供了理性的一贯性。理查德·贝茨争辩说：

战略研究的一个危险是：只看见军事的树木，却看不见政治的森林。在冷战时期，这一危险比今天要大。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危险则是：由于广泛地确定安全研究的领域，结果把军事研究排挤掉了。这一危险今天正在增大。对于下述问题，目前并无共识：关注军事问题是否依旧是社会科学的重要责任，甚至说，有关军事的知识，对安全研究来说，就好像有关经济体系的知识对政治经济学研究那样至关重要。^①

战略与安全研究：其名下都有什么？

战略研究一词，一直与美国的冷战军事研究方法紧密关联。它也被称作国家安全研究，因为实际情况大体上可以说是：美国人研究美国的安全。战略研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一直集中关注军事战略。^② 在这一方面，传统的战略研究一直是

^① R·贝茨，《战略研究会生存下去吗？》，载《世界政治学》第50卷第1期（1997年）第7页。

^② 美国主要的冷战战略家包括伯纳德·布罗迪、艾尔伯特·沃尔斯泰德、亨利·基辛格、威廉·考夫曼、赫尔曼·康恩和托马斯·谢零。见J·加内特《战略研究及其假定》，载J·贝利斯、K·布斯、J·加内特和P·威廉姆斯合编的《当代战略研究：第一卷，理论与概念》（伦敦1987年版），第7页。

国际体系中各种角色赖以达成其政治目标的军事手段。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角色，因为军事力量主要掌握在它们手中，一些非国家的角色，如恐怖主义者、分裂势力和民族解放运动等等，也被列入讨论范围之内。但所以突出国家的首要地位，还因为下述事实：那些非国家的角色通常要么旨在掌握现有国家的权力，要么旨在创建新的国家。

但究竟什么是战略？根据贝西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 Hart）的说法，战略是“配置和运用军事手段以实现政策目的的艺术”；但在海德雷·巴尔（Hedley Bull）看来，它是“为达到既定政策目标，对军事力量的运用”；科林·格雷（Collin Gray）说，战略是“军事实力和政治目的之间的关系”；而安德列·博弗列（André Beaufré）则主张它是一门“两个对立的意志运用力量解决其争端的辩证艺术”；路易斯·霍尔（Louis Halle）把战略研究定义为“政治科学的分支，内容是有关国家所能获得的战争能力的政治意义”。这样，我们可以说，战略涉及的是在国际关系中对力量的实际或威胁使用。因此，战略研究就是关于力量工具如何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伴随着美国主导的战略研究，一个“英国”或“英语的”学派发展起来了。在安全研究的主题下，它的考察范围更加广泛。作为对战略研究过分集中关注军事的反应，安全研究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开始风光起来。在对有关世界如何运转的基本设想的问题上，战略研究和安全研究并没什么不同，区别在于它们对安全威胁的认识上。

如上所述，战略研究的基础是对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解释。现实主义者主张，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本质，国家应对永久和平的可能性、世界政府和裁军的设想，以及诸如集体安全或合作安全这样的观念持怀疑态度。结果之一便是，战略研

究更多地集中关注国家所面临的军事威胁。而安全研究则拓宽了研究范围，不仅包括军事威胁，还包括非军事威胁；不仅仅包括对国家的威胁，还包括对非国家角色和次国家集团的威胁。

安全研究还包括了一个更激进的派别，即批判性安全学派。它运用批判理论的方法，对国际体系本身的性质，以及构成该体系的权力关系提出了疑问。批判性安全对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说，即国际体系是一个注定或既成的不变实体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与之相对，批判理论家们主张，国际“体系”是社会构成的，也就是说，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一致认为它应当存在。这并不是说，人们作出了自觉的决定，而是说人们的相互作用创造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其本质并非自然或绝对的。也就是说，批判性理论家们不像现实主义者那样，把国际体系看作无政府状态，而是把国际无政府状态看作一种社会构造出来的结构。因此，批判性安全理论关注的中心是改变我们思考安全的方法，改变各角色在体系中的作用，以及各角色对体系的构成。戴维·穆提默（David Mutimer）将在第4章中详细探讨和运用这一方法。

虽然安全研究采用了一个宽泛的安全定义，其结果是使它更加接近国际关系，而不是战略研究；但它与前者相比的确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它不仅研究战争的起因与结局，（这是许多国际关系学者的主要兴趣所在）它还研究战争的实施。战争的实施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因为走入战争的决策和战争的结局经常是取决于军事而不是政治。贝茨争辩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同模式（指40年代初，德国控制西欧的能力——它在1914年至1918年期间无法获得的结果）并不能只从实力指标（即人口、军队和经济的规模，可获得的自然资源的

数量等)中得到解释。相反,倒是德国军队成功地发明了闪电战战略(Blitzkrieg strategy),将军事新技术与装甲战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为其在二战初期胜利的关键因素。同样,德国在那场战争中的最终战败,也是消耗战和德国领导人战略和政治失算两方面因素相结合的结果。^①安德鲁·拉瑟姆(Andrew Latham)在第10章中就这一类型的问题分析做了更加详细的阐述。

战略研究在冷战期间的发展

在我们充分理解冷战结束对战略研究的影响之前,首先应当弄明白该领域在冷战前和冷战期间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很重要。探讨广泛的安全问题以及如何防止战争的第一本书是昆西·赖特(Quincy Right)于1942年出版的《战争研究》(Study of War)。该书与古典战略家的著作不同,它们多将战争看作国家的工具。而昆西·赖特所关注的却不是国家安全问题或国家战略的替代物,他把外交、国际谅解、仲裁、民族自决、裁军,以及集体安全,都视为国际安全与稳定的保障手段。^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关战争的研究继续沿着这一道路前进。战后初期的战略家们对四个关键性主题进行了探讨:第一,安全并非每个国家在每时每刻的头等大事,它只不过是一个重要的随历史环境而变的关切问题。这一领域的理论家们关注着军事安全与诸如经济福利和个人自由等其他价值之间的交换计算问题。其次,对国家安全而言,军事和非军事的政策工

^① R·贝茨,《战略研究会生存下去吗?》,载《世界政治学》第50卷第1期(1997年)第7页。

^② D·鲍得温,《安全研究与冷战的结束》,载《世界政治学》第48卷第1期(1995年)第119—120页。

具手段都很重要。第三，承认安全的困境（即一个国家增强其安全的行为会反过来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导致慎重使用军事力量。第四，在国家安全与国内事务之间，如经济、公民自由和民主程序等等，业已形成关联。^①

虽然这一类型的分析在冷战期间一直存在，但却处于边缘地位。因为战略研究的眼界过于狭隘，忽略了国内威胁和非军事威胁，集中关注核武器问题，以及由于美国丧失核垄断地位而导致全球核大战机会日趋上升的问题。在这一时期，战略研究繁荣起来了，因为核威慑在本质上具有很强的理论色彩；而实践性却不突出。在这一领域提出的重大问题是关于军备控制和有限战争的，其结果之一便是，通过威慑概念和美苏战略均势，冷战的安全日程被概念化了。这两个集团之间基于意识形态的复杂对立被简单化了，变成了控制联盟以及核稳定等问题。大家都认为，决定国家行为的，是实力地位政策，或者说，是通过以威胁操控和力量投送影响对手行为方式的战略来追求最大国家安全的政策。^②

这是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转变。虽然此前也有学者集中关注安全的定义问题，安全与其他目的相比的重要性，以及应如何获得安全，但新的关注焦点却是如何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用作政策工具，却又不冒核交战的风险。然而这一类型的思想过分关注军事工具，导致了过分强调国家安全的军事方面，而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等非军事方面关注太少。

由于集中关注核威慑及有限核战争等抽象理论问题，造成

^① D·鲍得温，《安全研究与冷战的结束》，载《世界政治学》第48卷第1期（1995年）第119—120页。

^② E·A·卡罗杰日，《安全研究在冷战后向何处去？》，载K·P·巴及派和S·P·科恩主编的《冷战后的南亚：国际展望》（Boulder, CO, 1993年版）第16页。